

深度品读

《旧时光》里的老太原

韩玉峰



近读厦门大学中文系文化学者、教授谢泳先生赠我的《旧时光——外省学者眼中的山西》(以下简称《旧时光》)一书。《旧时光》2000年1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,至今已有20多年。谢泳在“编后记”中说:所选“文章作者以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”“文章作者必须来过山西”。为这本书作序的著名评论家韩石山说:“你看这条件多苛,这眼光多刁!”

书中所选文章的作者胡适、吴宓、谢冰心等都是清末民初中国学界的名人巨擘。其中陶希圣、陈衡哲、顾一樵、范长江来过太原,有文字留下。

太原,山西省省会,别称并州,古称晋阳,也称龙城,有4700多年的历史,2500多年的建城史,“控带山河,踞天下之肩背”“襟四塞之要冲,控五原之都邑”,如此文化古都,历史名城,我倒想看看在这些学界大家“条件多苛、眼光多刁”的笔下,那个“旧时光”的太原到底长得个什么模样!

且看他们是怎么来到太原的。胡适留学美国时的朋友陈衡哲女士是1934年7月应孔祥熙邀请乘坐他的飞艇到山西太谷参观铭贤学校的。飞艇是由一个投掷炸弹的战斗机改装的。陈女士此行16人,加上艇上服务人员3人。飞艇从北平南苑机场起飞。大家坐稳之后,便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,要说话就得做哑戏或用笔谈。陈衡哲在《从北平飞到太原》一文中说,北平距太原270英里,飞行两小时半。下机后绥靖公署人员把他们安排在山西大饭店,算是太原的一个现代式的旅馆,有浴室,有电灯电话,这等标配让他们没有想到。

曾是《大公报》记者、做过新华社总编、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1937年3月的太原之行,对当时的太原机场可没有什么好印象。范长江在《太行山外》一文中说:“飞机在太原上空绕了一圈,一直离城往北飞,让我感到奇怪,后来降落以后,才完全是荒滩一块,大风刮得飕飕响,黄沙尘土满面飞,机场上什么人也没有,只有航空站上几个人在风沙中办理飞机过站的手续。站上的工友没有受过相当的训练,只是望着飞机出神,而不知道对上下客人应有的接待任务。我只好自己提了行李,经过野地,走向异常简单的村房,就是所谓航空站的地方。”真是委屈了范先生,假如他今天能来太原采访,可看看现在的太原机场是一番什么景象。太原武宿国际机场已开通客运航线130条,国际航线8条,年旅客吞吐量突破千万人次。范长江当惊叹今日并州风景绝与往昔殊。

曾做过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总主笔的陶希圣1933年10月曾有太原行,撰文《太原见闻记》,说他到海子边和南华门的树林下散步,见到“林下游人或是静坐,或是打拳。静坐林下,颇有出世禅的风味”。

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博士、曾做过清华大学教授的顾一樵对晋祠更感兴趣。他1937年6月在《太原之行》一文中说到晋祠的周柏、唐槐、难老泉、圣母殿,还有唐太宗李世民撰写的《晋祠之铭》,娓娓道来,细腻入微,可见他对晋祠知之详、爱之切。那几天太原久旱逢雨,顾一樵写道,“我们在雨后匆匆出了娘子关,带了山西的酒和醋回到古老的北平来。”

唐太宗李世民有句名言: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”。翻阅陈舜臣的《大唐帝国》时感受颇多,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王朝之一的唐朝,留给我们的丰饶的精神财富。自知领悟浅陋,因此所感只能算一点历史与现实的擦痕。

瓦岗军是隋末农民起义军中很有实力的一支,但在翟让统领时期,只能苟安一隅。《大唐帝国》中记载,其实翟让身边早已有一优秀谋士徐士勤,但徐比较年轻,“与其听年轻人出的主意,不如听上了年纪的人的建议,来得舒坦”。因此,翟让才接纳了前来投奔瓦岗的李密。这与唐太宗李世民的“吾为官择人,惟才是与。苟或不才,虽亲不用”“如其有才,虽仇不弃”形成鲜明对照。仅此一斑,不难看出,为何翟让终究不免一个草头王,而李世民却能成就为一代明君。

进入瓦岗军的李密,十分懂得用提升人生追求来凝聚人心,鼓舞士气。他对翟让说:我们必须让人们知道,我们不只是土匪集团。否则一旦没饭吃,大家的士气就低落,结果只有解散一途。要给他们理想,取得天下这个理想!正是由于瓦岗军开始有了夺取天下的追求,才逐步被整伤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。某种意义上说,放纵是人性中潜在的本能,修身是人性中的痛苦进化。只有树立了远大目标的人,才可能选择这种进化。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过这样那样的人生梦想。为了梦想,都曾充满苦读奋斗的激情。

我的阅读

历史与现实的擦痕

——读陈舜臣《大唐帝国》有感

茹肖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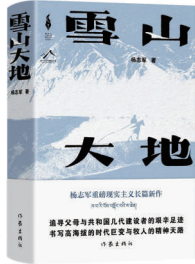
但随着岁月的磨蚀,生活的挫折,梦想大都凋零了。只有那些仍然能够保留着梦想,或者经过不断充实提升,树立起更大人人生目标的人,最终才会有大成就。目标决定动力,动力砥砺前行,行为展示境界,境界成就目标。

当初,李渊起兵感觉单薄时,刘文静劝李渊借助进犯隋境的突厥力量。李渊认为突厥是敌人,怎么可能呢?刘文静说:“当时你是以隋国将军身份和他们交战,突厥是隋国的敌人……一旦你决心举兵,你便不再是隋国将军,也就是说,突厥既不是你的敌人,也不是朋友。”“突厥是游牧民族,对于土地没有多大贪念。一起攻打长安,然后,土地归我们,财物归他们,这样不就圆满解决了吗?”果不其然,突厥兵帮助了李渊。司马迁说过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而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而往”。天下人是由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,物质利益抑或是精神利益。矛盾的产生,也多是缘于利益的分配。对于群体而言,群体利益的最大化,才是最高的准则。在群体利益当中,个体情感往往被群体利益所裹挟。当初,玄武门之变时,也许骨肉之情使李世民并没有痛下决心杀掉李建成。但是,群体利益使得李世民不得不背负起杀兄弑弟的恶名。因此,一个人要善于把握本分和进退,尽量避免因为要谋取小的利益而给自己、给群体带来大的灾祸,更不要因为个人不合于群体利益而被群体抛弃。要积极根据战略目标,及时调整利益分配格局,使一切利益都朝着最终的目标发挥作用。

以上几个事例,不难看出虽然都是军国大事,其实最终都落脚到了个人。一个人如果不想碌碌无为度过一生,就不得不首先战胜自己,正所谓:“一室不扫,何以扫天下。”不管多么美好的愿望,多么远大的抱负,只有通过不断完善自己,才有可能获得去实践自己理想的舞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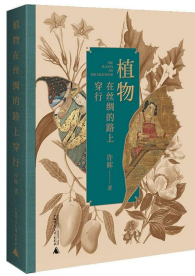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架

《雪山大地》
杨志军 著
作家出版社



刚刚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雪山大地》,是一部恢宏的草原史诗、一条流淌信仰的时代之河、一座献给青藏高原父辈们的纪念碑。作家杨志军重返藏地写作,以他标志性的诗性语言,展现了1949年以后地处黄河源头的青海藏区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,书写了汉藏两个家族、两个民族的生命传奇。作品入选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和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。

《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》
许晖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本书选取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十二种植物——小麦、葡萄、石榴、曼陀罗、黄瓜、红蓝花、枣椰树、水仙、甘蔗、淡巴菰、大蒜、芒果,以及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四种植物——桃、杏、芍药、桑,为你详细解读它们的“旅行”足迹、多样变迁以及在不同文化谱系中的象征意义;同时带你步入一幅幅中、西对照的历代名画,兼容并蓄中一睹植物在神话传说和现场倾情演出的无穷魅力。

《孩子的焦虑,父母来疗愈》
(英)安·考克斯 编著
中译出版社



本书是一本家庭自助心理指南,由英格兰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组织的认知行为治疗师安·考克斯和众多一线专家合著,为家长总结了解决焦虑的不同方法。书中分析了儿童及青少年身上常见的强迫行为、分离焦虑、饮食失调和自我伤害等8大焦虑类型和20多种情绪状况,为家长提出解决方案。同时也致力于协助家长照顾好自己,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孩子成长中的各个阶段。

连载



先定下的地方是长沙,这是当时中央政府给文化机关、研究机构定的一个重要集结地。7月间,梁实秋和叶公超两人逃出北平去了南京,找到教育部,要求给他们分配抗战工作,部里给了他们船票和路费,让他们去长沙集中待命,说不久就要发表成立临时大学的命令。李济和赵元任都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,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的回忆录里说,1937年8月他们奉命撤离南京,其路线也是经武汉到长沙集合。后来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也都由长沙往昆明撤退,那是战局发生了变化,长沙失陷在即,不得不采取的第二步撤退方案。

在天津小住了一段时日,10月初,一家人开始往长沙进发,历时二十多天,上下舟车十六次,进出旅店十二次,终

于在10月下旬到了长沙。在长沙过了一段相对平安的日子,大约两个月的样子,不久战局紧张,又开始往昆明撤退。从长沙到昆明,原本十天的路程,他们走了差不多四十天才到。路途艰难只是一个方面,主要是林徽因患了肺炎发高烧,在晃县一家小旅馆里,一住就是两个星期,直到经过治疗,烧退了才继续上路。到了贵阳又休息了十几天,这样走走停停,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。这次路上得的肺炎,一直没有痊愈,到四川李庄后,终于引发了已经康复的结核病。

到昆明已是1938年1月中旬了。他们一家,是当时撤退的文化人中,头一批到达昆明的。从头一年9月离开北平算起,共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。这行程数千里,途经数省



62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的逃难之旅,让林徽因有机会,全面认识了中国的社会现实,既领略了山川的秀丽,民风的淳朴,也见识了国家的积贫积弱,军民同仇敌忾,抵御外侮的精神风貌。逃难途中,包括往后一段时间,有件事给

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精神烙印,甚至影响到她后半辈子的人生态度。

1937年12月间,他们来到湖南和贵州交界的晃县(属湖南,现为晃侗族自治县),天色已晚,林徽因开始发烧,梁思成急于找个旅馆,把一家人安置下来。但是,在小县城转了一圈,才发现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。正着急时,听到一间旅馆楼上传出优美的小提琴声,两人循声上到楼上,原来是一批广东小伙子,梁思成会广东话(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),攀谈之下知道全是空军航校的学员,奉命往昆明撤退。听说他们一家五口没有住处,表示可以挤出一间房子给他们。第二天一早,学员们要走了,临别时,梁思成把他们到昆明后的住址告诉了这些年轻人。

本来只是小事一宗,谁在旅途中都可能遇到,但是,后来发生的事情,就不能说是小事了。

到昆明住下后,在晃县结识的那些航校学员,又跟他们联系上了,常来他们家的有七八个,来的时间一般是周末或节假日。林徽因像接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地接待他们,事实上,她也确实有个弟弟叫林恒的,也在这个航校服役,班次要晚些。林恒是十期,这些年轻人是七期。不久,要毕业了,他们的亲人多在外地,就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充当他们的家长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。毕业后,这七八个人大多分到了四川各地,担负空袭警戒与作战任务。大约1939年,拉小提琴的那个学员,最先牺牲。

随笔